

元曲作家之升沈(續)

紀庸

下 論後期作家

後期作家多係南人。「錄鬼簿」下卷分之爲四組：曰「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唯此一圖本不分類，又人數較少；(曹本五十五人，范本五十一人。)且其中有曹本列於已死、而范本次第則相當於尚存，如喬吉甫是。足見范本早於曹本。按吉甫卒於至正五年，則范本當是是年以前之稿，其間已幾經修改，則莫之知矣。

曹本五十五人中，除「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一項中高可通、董君瑞、李邦傑、高安道四人爲北人外，其餘皆在江南。鍾嗣成家在杭州，所與交接知聞皆在南方，此固然矣；北方文風衰落，作者凋零，要亦不可掩之事實，蓋此時雜劇中心有由大都南遷杭垣之勢。元初席金儒教餘勢，北方文學蔚然，匪唯曲文，詩詞亦有不少作家。如世祖時之樂城李治、永平王磐、陳州徐世隆、懷州許衡、柳城姚樞、澤州郝經、渾源雷膺、武安胡祇通、汲郡王惲、柳城姚燧、容城劉因，皆享盛名，士林推重。謂金世宗以來所培養之人才，此時始結實用世，亦無不可。則雜劇之盛，容與文風有關歟？反觀南風，斯時不競。方回、周密、白珽之流，號曰遺民，文風卑靡，振衰起廢，無以當之。稍後，臨川吳澄、吳興趙孟頫北遊，始稍露頭角。然至元貞、大德間，風氣漸轉，袁桷崛起於先，揚仲弘、虞集、范梈、揭傒斯四大家及黃潛、馬祖常、歐陽玄、柳貫諸人繼起于後，南方文學，稱盛一時。反觀冀北，則僅汶上曹元用、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稱三俊，(「元史」「曹元用傳」)最後則有湯陰許有壬、真定蘇天爵，其氣勢實遠遜。大抵南北時文之盛衰，以仁宗時科舉之復興爲轉移。自南方文學衰盛，雜劇之作亦漸多，且編著者皆爲南人，自不怪「錄鬼簿」下卷所舉多南士也。

顧此輩南方作者，實多爲北人移住者。例如宮天挺條：「字大用，大名開州人，歷學官，除約台書院山長。」鄭光祖條：「字德輝，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曾瑞條：「字瑞卿，大興人，自北來南，喜江浙人才之多，羨錢塘景物之盛，因而家焉。」趙良弼條：「字君卿，東平人，總角時與余同里閭。」(魏氏雖舊籍汴梁，但生長杭州。)陳無妄條：「字彥實，東平人，與余及君卿同舍。」喬吉甫條：「字夢符，太原人，居杭州太乙官前。」李顯卿條：「東平人，以父爲浙省掾，因居杭焉。」就此觀之，北人南移，頗成時代風氣。考厥原因，約有下云數端：一，征南軍之幕僚多慕江南風物，因留而不返。如「元史」「張弘略傳」：「有饒黃臣子在江南買田宅樂而忘歸者，同引弘略。」考弘略即張弘範兄，順天萬戶張柔子，所謂貴臣之子，必有所指，非全出諸虛構者。二，南宋平定後，所委派地方官，多係北人，此輩往往定居江南，不作歸計。元人文集碑誌傳狀中，此類資料不勝枚舉。蘇天爵「故承務郎祀縣尹閻侯墓誌」(「滋溪文集」卷十八)更作包括之論云：「比見中州士夫官遊於南方者，往往樂其風土之美，而無丘壟霜露之思，」蓋可概矣。三，基於軍事之必要，派往江南者，柳貫「承直郎管領拔都兒民戶總管伍公墓碑銘」：「(「柳待制文集」卷十)「初，世祖皇帝統壹寰宇，勅嘗護駕驍勇十一萬戶，留籍漢湖，令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置總管府爲署。」此制度是否亦行於江南他處，雖不敢懸斷，然其足以促進北人之南移，則不容諱言。江浙風物，遠邁北方；杭州景色，尤甲天下，南宋百餘年之經營，已使之成爲遊賞繁華中心，縱曾經兵燹，亦已逐漸恢復。「馬哥李」遊記「譽爲江南第一享樂都市，非夸妄也。考元初名士已多有南移傾向，如許子伯幾、李仲芳、高彥敬、梁貫父、郭天錫輩，皆會遊宦江南，最愛錢塘風物；(見柳貫「跋許子伯幾與仇彥中小帖」)而平宋功臣阿里海牙之孫貫酸齋，且即定居杭州矣。此種風氣，及至元統一後，更爲顯著。故「錄鬼簿」上卷作者

之北人，實已多有南遊而流連忘返者。白仁甫久居建康，前已論之，餘如大都王仲文會住金華，（見賈仲明批詞）馬致遠會為江浙省務提舉，李文蔚會為江州瑞昌縣尹，張壽卿會為浙江省務提舉，李寬甫會為合灤縣尹，趙天錫會為鎮江府判，尚仲賢會為浙江省務提舉，戴華夫會為浙江省務官，顧仲情會為清泉場司令，皆久遊南方者。關漢卿會有一「杭州景」一「南呂」一枝花，「（太平樂府）卷八」或亦會涉足江南。前代流風，後代加厲，元代末期，江南多北方流寓，由來遠矣。

北人南徙，則雜劇一藝亦挾與俱南，南人傳而習之，風乃驟盛。元末姚壽桐「樂郊私語」云：

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於潁川楊氏。當康憲公梓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嗣嗣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馳逐為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激雲漢。而康憲獨得其傳。今雜劇中有「漢賊吞炭」、「零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憲自製，以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耳。其後長公國材，次公少中，復與鮮于去矜交好，去矜亦樂府擅長。以故楊氏家僅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於浙右云。

鮮于去矜即鮮于樞之子，見「書史會要」。即此可見南人學習雜劇，多得北人之傳。——楊梓，據王靜安先生考證，即元時代爪哇功臣，海鹽人，官至杭州路總管。

茲再一探下卷作者之時代。依王靜安先生說，下卷作者時代，當分兩組：其一，「方今已死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為一組，其年代約在世祖統一至元至順帝後至元間。「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知者」為一組，為至正時代，與作者同時。前一組無問題，唯後一組是否作者及見至正時代諸作家，不無可疑。考「錄鬼簿」自序至順元年，下距至正凡十一年，此或最初寫定之年，其後又屢經修改，未可據以斷定。唯曹本記喬夢符之死，事在至正五年二月，自此以後，有無補訂，尚未可知。又考本書記其交遊最早者為大德七年，雖景臣條：「大德七年，公自維揚來杭州，余與之識。」由大德七年至至正五年，凡四十二年，姑假定鍾氏與唯景臣相交之歲年二十，則鍾氏當生於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以前。朱凱「錄鬼簿序」，嗣成為鄧善之祭酒、曹克明尚書弟子。同書趙良弼略傳：「總角時與予同里閭，同發蒙，同師鄧善之、

曹克明、劉聲之三先生。」鄧善之即鄧文原，「元史」本傳，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至大三年，授浙江儒學提舉。鍾氏既發蒙於鄧，年齡約在才歲以前，與前考生於至元二十五年以前，尚可符合。由此下推至至正五年喬夢符死時，嗣成至少六十以上矣。望六之年，恐無多餘暇詳紀當時劇人，「錄鬼簿」雖有至正二十年庚子朱經題詞，難保不出於鍾氏逝世以後。故吾人認為至正一代三十年間之劇人，鍾氏絕無由全親也。

復次，考朱凱至順元年所作序，會舉鍾氏作品，范本計有一「馮諼焚券」、「偽遊雲夢」、「斬陳餘」、「蟠桃會」等，范本多出「錢神論」、「章台柳」、「鄭莊公」，據云：「皆在他處案行。」作者作品既均在至順元年以前，（曹本略有增加，至少亦證明其大部作品流行於至順以前。）則其交遊之人，恐亦應與是時相先後。又周德清「中原音韻」作於泰定元年，中附「小令定格」，其「罵玉郎感皇恩採茶歌」，據鍾鈞先生疏證，當即鍾作，又見「太平樂府」。當泰定元年以前，作者之小令已有充「定格」之資格，則所謂方今才人，與鍾相識之同輩，其年代應亦不能相距太遠。故依此推論，其段落當在泰定（一三二四）至順（一三三〇）之間。

抑由作家年代之可考者觀之，大率皆為至正以前成名之人，間有一二年輩稍晚，然終不足以代表多數。例如：（加*者為散曲家，並舉以便通觀。）

- 1 黃公望* 即黃大癡，至元五年生，至正十四年年八十六歲卒，見「癡年錄」，為編者之大前輩。
- 2 吳仁卿 即上卷跋尾所稱之克齋先生吳公，由稱謂可斷定為編者之前輩。
- 3 張可久* 散曲大家張小山，「中原音韻」小令定格舉其「紅綉鞋」、「滿庭芳」、「醉太平」、「山坡羊」等作品，大約亦泰定時成名者。「陽春白雪」年代更早於「中原音韻」，其中已收張作矣。
- 4 錢霖* 「錄鬼簿」注：「字子雲，松江人。棄俗為黃冠，更名抱素，號素庵。」此人年代略遲，據鄧復讐「曠術詩選」一「挽錢素庵鍾師」（卷六）一詩所排之年代比觀，其卒年應在正十至一年至二十一年間。

5 鍾再思* 數曲大家徐甜齋。「中原音韻」定格中教其「水仙子」，

應是泰定間人物。

6 屈子敬 鍾云：「與余同窗」，其年輩應與鍾氏同。

7 高克禮*

「元詩選」突集已之上：「高克禮，字敬臣，河間人，舊官至慶元理官，……工古今樂府，有名於時云。」喬夢符小令有「秋曰與高敬臣、胡善甫輩飲湖樓即事」及「高敬臣病」一折桂令，當是喬之同輩。

8 陸登善

即上卷跋中所云陸仲良，應為編者之同輩。

9 朱 凱

作「錄鬼簿序」，稱編者為「大梁鍾君」，按口氣當為鍾之先輩。

10 朱 暉

著有「優戲錄」。楊維禎「東維子文集」載有此書序文，所附日期為至正六年，則此人或年輩稍晚。

11 王仲元

鍾氏稱：「與余交有年矣」，當是同輩。

12 張鳴善

元末王逢「梧溪集」一「儉德堂寄懷凡二十二韻」一題中有此人，稱「張鳴善名擇，湖南人，以晦迹擢江浙提學，今謝病歸吳江。」其詩見「皇元風雅」及「元詩選」突集，丁。王靜安先生以為鍾書稱張「揚州人，宜慰司令史」，恐與「梧溪集」所舉為二人。此雖不可揣斷，但可能湖南係淮南之誤。按「梧溪集」寄懷之作，在至正十一年以後，故范本「錄鬼簿」無此人，唯曹本有之。又天一閣藏無名氏「錄鬼簿續篇」亦有張鳴善，云：「北方人，號頑老子，有「英華集」行于世，蘇昌齡、楊廉夫服其才」，此恐另一人矣。

上舉皆「方今才人相知者」，除鍾氏外，餘悉年代不詳。又如「方今才人聞名不相知者」中之高可通、潘君瑞、李邦傑、高安道等四人，蓋、高二人，活動之年代較早，散曲雖本「陽春白雪」，「選中古今姓氏」曾舉二人之名，「白雪」年代早於「中原音韻」，前已言之，故二人之年代當不能太遲。通觀方今才人，無論與不知，其活躍於至正以後者，十無一二，則「錄鬼簿」下卷作家之年代約略可知矣。

況至正十年以後，元室已趨崩潰，江南到處叛離，烽火頻驚，藝事驟已陷於停頓，至少作為雜劇中心之杭州已呈糜爛狀態。考至正十二年，徐

壽輝陷杭州，「舉火焚城，殘蕩殆盡。」（見「櫻味錄」，「西湖遊覽志餘」同。）十六年七月，張士誠攻杭州，江浙行省達識帖木爾以苗軍楊完者之援，擊退之，而苗軍暴亂，人民飽受其殃。邵復儒「丁酉早春試筆東錢南金云：」（「蟻術詩選」卷一）「亂後無詩作好春，春光却又憫詩人，溪頭舉目暗傷神。楊柳官橋人跡絕，杏花歌館燒痕新，相期何處避兵塵！」（「浣溪沙」）丁酉為至正十七年，正刻後一年，杭州景象如此，猶能歌舞昇平乎？十八年八月間，士誠與達識和，授士誠太尉，用其兵殺楊完者。士誠兵入杭垣，（「輟耕錄」）士誠稱吳王，以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駐杭州。（「元史」）十九年十二月，朱元璋既下金陵，移兵攻杭，困城三月，民苦飢餓。（「西湖遊覽志餘」）陳基「夷白齋稿」一「精忠廟碑」：「至正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實帖木爾公與太尉吳陵張公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嗣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即記此時事也。在此種情形之下，吾人大致可以斷言絕不容產生若干劇作家，故王氏之說恐有未妥。

再論後期作者之交遊身分。

後期雜劇作者，按曹本為二十三人，范本十七人，論其教養如：

宮天挺 見其吟咏文章，筆力人莫能敵，樂章歌曲，特餘事耳。

范 康 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

沈 和 能詞翰，善談諧，天性風流，兼明音律。

陳以仁 能博古，善謳歌。

趙良弼 公經史問難，詩文酬唱，及樂章小曲，隱語傳奇，無不究竟。

周文質 體貌清癯，學問該博，資性工巧，文筆新奇；家世儒業，俯

就路吏；善丹青，能歌舞，明曲調，諧音律。

由此知諸作者皆才能風流之士，教養甚高，唯其社會地位，求如白仁甫、侯正卿、史九散仙者，實寥寥若晨星。以語官階，除宮天挺「歷學官，除鈞台書院山長」，屈子敬「以學官除路教」外，殆皆胥吏之流，無一命之寄。較之前期，或為萬戶，或為千戶，乃至縣尹、知州、儒學提舉等類亦不乏，相去遠矣。況即以學官論，在元末猶非清高，吾衍「聞居錄」

曰：「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爲之者多非其人，利祿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答。或耳語之曰：戴聖！遽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如此。」學官至是，尙能爲士林所尊乎？朝廷不以學官爲重，蓋委不學之人，卽此可知。是故宮、屈二人卽謂沈滯末僚亦無不可。故鍾氏自序云：「余因暇日，緬懷古人，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藝，俱有可錄，歲月彌久，溼沒無聞，遂傳其本末，弔以樂章。」蓋鍾氏亦深以此諸才人之遭逢不遇爲嘆也。

尤可注意者，後期曲家與正統文人幾無關涉。是時詩文巨子如虞集、楊仲弘、范梈、揭傒斯、柳貫、黃潛、戴傳良、張養浩、許謙、馬祖常、歐陽玄、許有壬……諸大家文集，全無曲家名字。卽較小作家之文集，亦少與此輩詩應之作。周密、仇遠、張雨、吾丘衍、倪瓚、邵復儒諸人，生長杭垣，耳目所接，其集中竟亦不及此，唯張小山、錢素庵少數散曲作家略與周旋而已。此與前期作家常共文人往還者，亦大異厥趣。以意度之，後期曲家與文人實全然兩事。由此，更足判定後期作家社會地位之低落。考其原因，可得而言：

一，由於科舉之復興也。仁宗延祐初復科舉。元初廢科舉後，文人才無所歸，泛濫於曲文。及科舉復興，學者專力科第，雜劇遂被捐棄。而爲之者，或落第士子，或末流文士。「錄鬼簿」編者本身「果試於有司，命不克遇」，可爲一斑之證。

二，由於南北士風之差異也。後期作者多南人，前已述矣。唯此輩作者或北人流寓，或落魄不遇，根本不得與於士大夫之林。南士對於劇曲，固始終不與重視者。此與元初北方學者多對曲文感到興味，大不相同。蒙古風氣，多乘于金，金末北方曲文已流行，學者中如元遺山、李治咸重視之，故一般儒生樂此不疲，及元而更烈。南宋時，據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段數目錄，雖當日亦有戲文流行，然如「都城紀勝」、「夢梁錄」諸書所紀，實多出於市井。元力南漸，雜劇更挾之俱來，終使杭城成爲演藝中心；唯此乃民衆之事，儒生則一意於詩餘之製，以寄感懷。因之，對於倡優之事，所紀殊罕，甚且從而嫌惡之。如張炎「詞源」：

「鼓風弄月，陶寫性情，詞苑於詩；畫聲出於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鄙乎鄭衛，輿輿令何異也！」

總令，見「都城紀勝」，指俗曲。此可見文人對俗曲之態度。又如沈義父

「樂府指迷」：

「然後知詞之作難于詩，畫音律欲其高，不爲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

詞曲之判，尤爲顯然。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若今書會所關難者，尤無謂也。」書會前已釋之，謎卽商謎、隱語之類，其態度更爲冷淡。若以與元初北方諸學者較，誠有運庭之異。南士所以對北曲如是厭拒者，或與元代歧視南人有關。蒙古統一，分人爲四等，南人尤低於漢人，當然足以引起南方士族之反感。故自元至延祐四十年間，竺守舊風，不肯輒改。且北人南下，多有狐假虎威，使南人難於忍受者。鄭元祐「遜昌山樵雜錄」記鄭思肖：「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周密呼白仁甫、侯正卿爲「北客」，亦寓輕蔑之意。又如郭昇「客杭日記」至大戊申九月十八日條云：「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睡。」則北客已成輕辱北人之代名詞。對北人白眼，對雜劇自不容青睞。加以雜劇用韻，全係北聲，只有平上去，而無入聲，南人聞之，尤覺不習。以爲北方文藝不執古法，粗俗不堪。邵復儒「續詩選」卷三「賀新郎」序：「沙德潤、任以南相與追和賈酸齋琵琶詞韻，拉予同賦，第元韻出入，讀之不純也。」詞中句云：「便有傳來中原韻，終帶穹廬煙月。」以賈氏用韻爲不純，爲穹廬味，其不屑可見。

三，由於元代前後兩期風氣之不同也。元初對中土，頗施壓力，以是思想倫理多有轉變，無論統治者及被壓迫者，均充滿反抗空氣與心理。在此新政風新思想激蕩之下，曲文遂以嶄新體製，大受上下歡迎。此世祖時之事也。成宗以後，蒙古逐漸漢化，原始壓力不免中弛，漢文化之舊傳統，乘此極力復振，終至使野蠻之蒙古文化不得不低首下心。觀英宗時輔相拜住排斥佛教而親儒士，其轉變之劇可知。至文宗時，居然愛好書畫，自操翰墨，儼然一中國文士。內廷有此轉變，外方當亦隨之，舊文物舊制度之復興，乃如雨後春筍，崩坍而來。元初名公巨卿多爲散曲，如「錄鬼簿」上卷所云；至此時，則公卿誰復爲此，大半向經義、詩賦中討生活。「錄鬼簿」下卷雖亦稍及方今名公，但其地位不過照磨、知州、府判、總管，尙書水腳不過一二，地位已不足與元初者頡頏。夫君子之德風，上好下甚，以故元代末期，通南北劇人，無復名儒碩士之選。其間關係時會轉移，非偶然也。

（接上第十九面）